

## 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大跃进时期教育的影响\*

李若建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人口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论文试图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去了解大跃进时期的教育。1949年后, 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干部群体规模的膨胀, 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大跃进时期教育变更的最大特点是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更加政治化, 而教育规模扩大与大跃进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法满足有关, 政治化也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手段相关。

**关键词:** 大跃进; 社会流动; 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4)02-0080-07

随着对大跃进研究的深入, 使人认识到在当年政治领袖和民众的激情背后, 隐藏着一种理想境界的梦幻, 在大众躁动的行为当中, 透露出一种相当理性的追求。如果分析一下大跃进时期的教育变更, 对全面了解大跃进应该有所帮助。要强调指出的是, 本文用的是“变更”这一中性概念, 表示对大跃进中教育界发生的事情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在这里不存在对当年的指责, 而是一种沉重的反思, 反思的焦点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教育。

在整个社会的浮夸风下, 许多事情被夸大了, 这也包括教育在内。关于大跃进中教育工作中的失误与荒唐可以罗列许多,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些今天看来是荒唐的东西, 有些是浮夸出来的, 未必真实存在。例如四川省新津县城关镇蔬菜社挂牌“红专大学蔬菜系”、制造牙刷的小工厂挂牌“红专大学牙刷系”、一个公社的财粮办公室挂牌“红专大学财会系”、猪圈门口挂牌“红专大学养猪系”, 公社干部说这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sup>[1]</sup> 这种情况与今天基层应付上级的检查没有本质的区别。

导致大跃进时期教育变更的原因并非单一, 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至少下面两个因素起重要作用。一个因素是高层领导人的决策错误, 今天看当时一些领导人关于教育的谈话, 其中不乏荒谬。1958年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在北京农业大学说, 教授要按所种作物产量评级, 亩产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 二千斤的四级, 三千斤的三级, 四千斤的二级, 五千斤的一级。<sup>[2](P225)</sup> 如此荒唐的说法出自高级领导之口, 基层自然也跟着荒唐。还有一个因素是教育界在反右运动中损失惨重, 一大批比较正直和敢于直言的教师被打成右派, 而在1958年又在高校中开展“拔白旗”运动, 这些都让相当一部分教师对一些事情明知荒谬而噤若寒蝉。例如1957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 其中教师4.1万人, 占58%。广东省有3.7万人被打成右派, 其中教师1.3万人, 占35%。<sup>[2](P200)</sup> 在“拔白旗”运动中, 进一步打击了教师和学生, 武汉大学14%的教师和9%的学生受批判, 武汉医学院50%的正副教授被作为“白旗”。<sup>[3]</sup> 在如此高压之下, 逃过劫难的教师, 有胆量挺身而出者恐怕是寥若晨星。

本文并非是对大跃进时期教育变更的全面描述, 也无意对其成因作全面研究, 只是想指出在大家都意识到的成因之外, 社会流动模式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流动模式的改

\*收稿日期: 2003-09-01

作者简介: 李若建(1956-), 男, 福建厦门人,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变，对大跃进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在教育界这种影响同样存在。

## 一、大跃进时期教育的两大特点

在大跃进中，教育始终没有唱过主角，虽然有了一些荒唐的浮夸“卫星”放出来，比如出了多少诗人，又办了多少大学，多少人脱盲等等，但是与工农业生产中的浮夸相比是小巫见大巫，让人回味无穷的不太多。当年的教育革命没有太多明确的指标，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纲领性文件，因此下面有关大跃进时期教育的两个主要特点是笔者根据当年的情况综合出来的。

第一个特点是教育规模膨胀，教育对象普及，然而现有的资源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规模膨胀，因此滋生出种种荒谬。从1958年开始各级各类在校学生规模膨胀，到1960年达到一个高峰。与1957年相比，1960年普通高校学生增加了118.1%，中专（含技校学生）增加了184.8%，高中学生增加了85.3%，初中学生增加了59.7%（如果考虑到230万的农业中学学生，初中阶段学生实际增加了102.5%），小学生增加了45.9%。这里要注意的是，学生人数增加最快的是中专，其次是大学，第三是高中，还要注意的大量农业中学学生的出现。

表1 1957~1963年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万人）

年份	普通高校	中等学校				小学	幼儿园
		中专、技校	高中	初中	农业中学、职业中学		
1957	44.1	77.8	90.4	537.7		6428.3	108.8
1958	66.0	147.0	117.9	734.1	200.0	8640.3	1950.1
1959	81.2	149.5	143.5	774.3	219.0	9117.9	2172.2
1960	96.2	221.6	167.5	858.5	230.2	9379.1	2933.1
1961	94.7	120.3	153.3	692.5	61.2	7578.6	289.6
1962	83.0	53.5	133.9	618.9	26.7	6923.9	144.6
1963	75.0	45.2	123.5	638.1	30.8	7157.5	147.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除了教育规模的扩大之外，扫盲与业余教育也达到一个空前的程度。虽然在扫盲过程中荒唐与浮夸的事例比比皆是，但是客观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当时的报道，1958年1~8月全国共扫除文盲9000万人，全国67%的市县基本上扫除文盲。有海外学者认为，大跃进中的扫盲运动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sup>[4]</sup>1958年10月末，山东省宣布在大跃进中扫盲780万人，而有人认为实际只有150万人<sup>[5](P171)</sup>。如果山东省的推断可以代表全国的话，大跃进时期扫盲人数大约在2000万人左右，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成绩。然而扫盲之后，还需要一个巩固时期，否则已经学习到的东西很快会忘记。据俄国的一项研究，在小学毕业后三四年，所掌握的知识很大部分已经丧失。<sup>[6](P90)</sup>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后人可能会低估当年扫盲的成果。

第二个特点是政治办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反右运动之后，一方面是大量的教师被打成右派后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学校教师不足，另一方面是上层有感于学校内的意识形态有问题，需要充实政治领导，因此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大量人员进入学校。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1000名高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至1959年2月，仅山西、辽宁、河南等16个省市派到高等学校担任总支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有1230人，到中等学校担任校长、支部书记和教导主任等领导工作的有6162人。<sup>[2](P202)</sup>派到学校担任教师（绝大多数是中学教师）和小学校长的干部有134530人。<sup>[2](P208)</sup>

由于职业习惯，党政干部担任学校领导后，政治办学的现象在大跃进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有的县提出“人人是劳动者，个个是大学生，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几个月内建成所谓农业大学448处，几乎村村有大学，由乡村干部、小学教师、老农、劳动模范担任“教授”<sup>[5](P175)</sup>。有的地方还实行

“住校供给制”，山东范县在1958年用10天时间，在全省首先实行学生吃饭不要钱和集体住宿，把6.5万名儿童集中在130所学校，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的集体生活。<sup>[5](P176)</sup>类似的情况在全国不少地方也存在，例如湖北商城县把全县小学生集中在250所学校，学生吃饭不要钱，冠名为共产主义学校。<sup>[7]</sup>这种情况持续不久，山东省临朐县的一个共产主义小学，因为学生病号多，减员严重，只存在不足10周。<sup>[8]</sup>1958年山东省肥城县出现了把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合并在一起，变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线串”的“共产主义学院”<sup>[5](P179)</sup>。

为了政治上的正确，就必须紧跟形势，同时也因为要走“又红又专”的教育道路，因此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大幅度增加。1958~1960年间，山东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平均劳动天数约占学生在校总天数的40%左右，其中1958年约占70%左右，学生已经基本不能学习，1958年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共建高炉7431个，炼铁炉8691个，大批学生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sup>[5](P152)</sup>1958年广西民族学院规定学生每年劳动70天，西南民院有的系劳动时间占学生有效学习时间的34%。<sup>[9]</sup>云南省楚雄县的南华中学，1958年学生只用不足4个月的时间完成一年的课程，其他时间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sup>[10]</sup>学生参加劳动未必不好，但是劳动时间如此之多，基本上到了无法正常学习的程度。

## 二、升学的压力与升学率的上升

大跃进中教育规模膨胀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在1957年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升学压力。表2至表5是大跃进与随后的困难时期前后的各级学校入学率、升学率。从表中不难看出，在1957年小学的人学率与各级学校的升学率都不高。大量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无法上学、升学，这种压力大到引起社会动荡的程度。在河南许昌与学校师生的座谈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说1957年5个小学毕业生中有4个不能升初中，在110万初中毕业生中有83万不能升高中。<sup>[11]</sup>在内部刘少奇表态说，闹翻了天也还是无法升学。<sup>[12](P16)</sup>他在湖南长沙等地和中学生座谈，劝导学生回乡务农。

下面是笔者见到的几个学生闹事的事例：1957年5~6月内蒙古自治区平泉地区丰镇中学学生因升学、就业问题而集会、罢课、游行，要求扩大招生比例。萨拉齐县等地学生派代表到丰镇声援，形成所谓的“丰萨事件”。<sup>[13](P520)</sup>1957年6月湖北汉阳县初中毕业生因传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太低而引发骚乱，事后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3名教师被处死，此案在1986年被平反。<sup>[14]</sup>1957年7月云南省罗平县中学初中毕业生因不满大部分人不能升学、分配工作，需要投入农业生产而闹事。<sup>[15](P169)</sup>1957年河北饶阳县300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1/4能够升高中，当消息宣布后，愤怒的学生在黑板上写道“饶阳初中生，白搭9年功，高中没考上，师范不招生，出路只一条，回家把地种，宏愿何处诉，愤恨怎能平。”<sup>[16](P289)</sup>

表2 1957~1963年适龄人口与小学招生人数(万人)

年份	小学招生	以1953年人口普查计算		以1964年人口普查计算	
		适龄人口	入学率	适龄人口	入学率
1957	1249.2	1670.4	74.78	1557.8	80.19
1958	3000.5	1724.4	174.00	1538.2	195.07
1959	2049.1	2190.0	93.57	1784.0	114.86
1960	2494.3	1898.1	131.41	1833.8	136.02
1961	1647.1			1921.2	85.73
1962	1586.3			2050.2	77.37
1963	1698.2			1867.8	90.92

说明：本表只是根据1953、1964年的两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推算当时的小学入学率，由于人口变化过程中存在死亡因素，特别是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比较高，对人口变化影响很大，因此以1953年数据推算会出现入学率偏低，以1964年数据推算会出现入学率偏高的情况，真实的入学率应该介于两个数字之间。

资料来源：〔1〕《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年版。

〔2〕《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表 3 1957~1963 年小学毕业生、初中招生人数与升学率（万人、%）

年份	小学毕业生	普通初中招生	农业中学招生	升学率	
				包含农业中学	不包含农业中学
1957	498.0	217.0			43.57
1958	606.3	378.3	200.0	95.38	62.39
1959	547.3	318.3	105.2	77.38	58.16
1960	734.0	364.8	95.3	62.68	49.70
1961	580.8	221.8	29.7	43.30	38.19
1962	559.0	238.3	15.0	45.31	42.63
1963	476.8	263.5	16.7	58.77	55.2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表 4 1957~1963 年初中阶段毕业生、高中阶段招生人数与升学率（万人、%）

年份	初中阶段毕业生		高中阶段招生		升学率
	初中	农业中学	高中	中专	
1957	111.2		32.3	18.6	45.77
1958	111.6		56.2	109.6	148.57
1959	149.1	2.1	65.6	100.0	109.52
1960	142.2	14.9	67.8	150.5	138.96
1961	189.2	16.1	44.7	22.7	32.83
1962	158.4	4.5	41.7	5.1	28.73
1963	152.3	2.4	43.4	20.2	41.11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表 5 1957~1963 年高中阶段毕业生、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与升学率（万人、%）

年份	高中阶段毕业生		普通高校招生	升学率	
	高中毕业生	中专毕业生		包含中专	不包含中专
1957	111.2	14.6	10.6	8.43	9.53
1958	111.6	19.1	26.6	20.35	23.84
1959	149.1	28.9	27.4	15.39	18.38
1960	142.2	26.8	32.3	19.11	22.71
1961	189.2	34.0	16.9	7.57	8.93
1962	58.4	30.5	10.9	5.77	6.88
1963	152.3	19.6	13.3	7.74	8.73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大跃进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让想读书的人有书可读。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在 1958 与 1960 年小学入学率超过 100%，1959 年也接近 100%，这说明了不是过去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上了学。从表 4 中可知，1958~1960 年高中阶段的升学率超过 100%，也表明了大量过去没机会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可以继续深造。值得注意的是，升不了学的初中毕业生是 1957 年闹事的主体，在 1958~1960 年间他们绝大部分如愿以偿了。

在当年的比较正规的办学形式中，农业中学应该是从管理到教学方面都属于比较差的一类学校，但是从局部地区的情况看，大部分学生是比较投入的，还是愿意上学的。江苏省句容县的调查结果显示，43.5% 的学校出勤率超过 80%，但是也有 26.1% 的学校出勤率不足 60%。<sup>〔17〕</sup>

### 三、干部群体的扩张与对教育需求的膨胀

大跃进时期教育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结果。教育是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有学者认为教育是改变低社会地位恶性循环的重要环节。<sup>〔18〕(P140)</sup>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不少人接受教育的动机。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社会流动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模式改变为：家庭出身 + 本人政治表现 + 领导赏识。<sup>〔19〕</sup>

在这个模式当中，家庭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让领导赏识主要是个人的权术问题，而本人的政治表现则是个人的能力。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中，“又红又专”是最佳的政治表现，“红”是政治上的正确，“专”则是个人的业务能力。要作到“红”并不要通过专门的训练，完全可以模仿成功者的行为，只要紧跟上级意图，基本上就是“红”。要作到“专”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而这种训练又主要依靠教育来完成，因此对教育的社会需求是相当可观的。就算是走“白专道路”，只要在政治上不列入反动之列，有中专及以上的文凭，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还是要比工人、农民丰厚。对于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教育成为他们维持一定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因此对教育的期盼也特别强烈。

1957年周恩来在一次大会上对中学生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升入大学做大学生，做高级知识分子，当干部……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sup>〔2〕(P193)</sup>周恩来的意思是劝说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但是也承认了当时接受高等教育是取得向上社会流动的一个条件。

就是那些在大跃进中昙花一现的“革命大学”之类，在其中学习一段时间对向上社会流动也有所帮助。例如四川省蓬溪县的“农业革命大学”停办后400名学生的去向为：到县以上党政部门工作的占35%，参军提干占4%，本县的县以下基层干部占41%，从事工商业占12%，回乡务农只占4%。<sup>〔20〕</sup>

1949年以后，中国产生了“干部”这一群体，这是一个庞杂的群体，有党政机关的高级官员、普通职员，还有科教卫生人员、文艺工作者等等。虽然干部群体十分庞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属于组织人事部门管理，而工人属于劳动部门管理。在待遇上，总体上干部的待遇比工人优越，比农民就更加好得多。干部的来源很多，有军队的转业军人，有从工人农民中提拔，但是大部分干部，特别是科教卫生人员来源基本是大中专毕业生。因此，接受中专以上的教育是成为干部的重要渠道。

建国后干部队伍迅速膨胀，1949年国家干部72万人，1952年331万人，1955年527万人，1958年达到792万人。<sup>〔21〕(P244)</sup>从表6中河北省的情况可知，在1949~1960年间，干部数量平均每年递增4.5%，干部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0.5%上升到1960年的接近2%，这种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导致干部群体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使旧的社会上层群体大部分被打倒，产生了大批新社会上层人物，带来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因素，政府机构大规模扩张，干部队伍迅速膨胀。第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教育卫生等专业人员的需求增加。在上述几种情况增加的干部中，大部分人员需要一定的教育，特别是专业人员更加要接受专门训练，这些导致了对教育的需要上升。

表6 1949~1963年河北省干部统计

年份	人数		分布(%)			
	万人	占人口比重(%)	机关	企事业单位(不含中小学)	中小学教职员	合计
1949	46.3	0.50				
1952	63.5	0.90	40.92	19.44	39.64	100.00
1955	62.6	1.03	43.34	23.79	32.87	100.00
1960	75.2	1.99	24.18	49.50	26.32	100.00

资料来源：河北省委组织部编：《河北省干部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藏书。

干部队伍的扩张,给大批人带来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也给更多人一种向上流动的期望。然而期望不等于现实,特别是期望很可能超越现实。社会学家戴维斯(J·C·Davies)认为人们期望的增长比实际的增长要快的快,因此在期望与实际之间形成一个差距,这种差距引起不满足感与挫折感。<sup>[22]</sup>如果用戴维斯的这一观点去分析1957年的学生闹事,可以比较好的说明在相当程度上是学生升学欲望与学校实际的接纳能力之间的差距的结果。大跃进正好提供一个机会,充分满足了民众的教育需求,因此大跃进中许多有关教育的荒唐行为,是民众发自内心的热情。

如果从1957~1960年各地区大中专在校学生增长情况来看,可以进一步看出民众向上社会流动欲望对大跃进教育变更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大中专毕业生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群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是由国家负责毕业分配,而且是有干部身份的人。从表7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一个有启发的现象,就是当年经济落后地区往往是大中专学生增长特别快的地区,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有8个地区大学生增长幅度超过200%,依次是青海、江西、广西、内蒙古、宁夏、贵州、河南和广东。同期有7个地区中专在校学生增长超过300%,依次是湖南、安徽、内蒙古、河南、宁夏、甘肃和新疆。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这种情况反映了落后地区对教育的渴望超过沿海发达地区。

由于资料不足,因此对各省内的教育发展的情况无法作全面分析,但是从局部地区来看,同样存在越落后地区发展越快的情况。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大跃进的1958年首次办起大学,在1957~1960年间,中专在校学生从444人增加到2973人,<sup>[23](P593)</sup>增长了596.6%,增长幅度远远超过贵州省的平均水平。

当年城镇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往往是内陆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省区,<sup>[23]</sup>从当年职工人数增加的情况来看,内陆地区增长幅度也超过沿海。<sup>[23]</sup>从城镇人口、职工人数、大中专在校学生人数,都是内陆地区增长幅度比较高。这种相似的情况体现出,越落后地区民众想摆脱贫困的向上社会流动心态远远超过沿海。大跃进在客观上给落后地区民众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于是不少人抓住了机会,但这种机会对绝大多数人只是昙花一现。

表7 各地区1960年比1957年在校学生增长幅度(%)

地区	高等院校	中专技校	高中	初中		小学	全部学生
				含农业中学	不含农业中学		
北京	60.16	92.94	41.40	74.63	60.19	119.44	100.37
河北	167.76	185.21	159.33	77.99	22.08	25.72	33.42
山西	151.59	184.95	109.64	171.47	125.02	42.98	53.27
内蒙古	320.94	374.04	110.84	131.06	78.86	85.80	92.48
辽宁	139.64	200.16	67.53	49.36	13.67	37.54	42.06
吉林	103.87	59.35	76.92	73.92	34.06	65.68	67.01
黑龙江	100.41	80.53	97.60	101.62	78.85	73.84	76.65
上海	64.15	208.80	30.52	34.27	17.59	108.37	88.80
江苏	132.79	157.12	77.98	129.79	67.23	39.72	48.91
浙江	134.05	261.18	49.48	130.92	98.26	62.27	68.27
安徽	167.01	423.74	96.94	173.63	140.63	13.50	23.47
福建	198.21	222.35	51.55	123.66	92.32	65.04	71.28
江西	391.56	181.94	119.21	144.69	98.44	55.34	62.71
山东	175.00	251.42	132.76	130.41	89.66	47.53	53.53
河南	216.29	339.07	70.32	68.96	18.28	44.35	47.99
湖北	80.12	85.13	117.09	153.64	125.75	41.32	49.04
湖南	151.25	503.73	161.56	203.48	132.19	53.13	63.45
广东	205.23	163.60	70.14	69.04	52.45	39.35	43.53

广西	368.80	159.36	83.20	65.32	30.21	25.79	29.58
四川	96.98	138.42	66.34	124.37	38.40	48.29	53.83
贵州	253.51	114.84	150.59	219.52	167.10	37.77	45.23
云南	95.81	111.33	92.31	90.49	57.41	41.08	44.67
西藏				200.00	200.00	950.00	914.29
陕西	67.91	99.73	108.68	112.44	74.80	52.95	59.56
甘肃	136.76	305.39	119.30	182.17	182.17	38.66	47.02
青海	2441.01	13.40	262.50	91.86	91.86	74.03	77.06
宁夏	254.10	337.22	175.00	101.10	81.32	99.30	102.53
新疆	39.73	301.31	254.17	138.68	138.68	82.32	91.29

说明：〔1〕天津当时属于河北省。

〔2〕宁夏高等院校学生是1960年比1958年增长数。

〔3〕全部在校学生不包括幼儿园。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77~1028页中的统计资料计算。

理解了教育对当年社会流动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当时教育的政治化色彩加强现象。因为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为了社会流动，那么为了政治上的正确而在教育工作中紧跟上级指示，以求达到目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参考文献〕

- 〔1〕新宇. 大跃进时期城乡风闻录〔A〕. 新津文史资料(5)〔C〕, 超星数字图书馆藏书.
- 〔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Z〕.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 〔3〕罗平汉. 大跃进中几所高等院校的“拔白旗”运动〔J〕. 文史精华, 2000, (11).
- 〔4〕〔日〕浅井加叶子. 1949~1966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J〕. 当代中国史, 1997, (2).
- 〔5〕山东教育40年编委会. 山东教育40年〔Z〕.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 〔6〕〔苏〕米罗诺夫.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7〕阎玉坤. 商城1958〔A〕. 商城文史资料(4)〔C〕, 超星数字图书馆藏书.
- 〔8〕冯益智. 我对大办“共产主义”小学的点滴回忆〔A〕. 文史资料选辑(14, 山东临朐)〔C〕. 超星数字图书馆藏书.
- 〔9〕唐纪南. 和共和国一起成长〔J〕. 民族研究, 1995, (1).
- 〔10〕石正文. 大跃进中的南华中学〔A〕. 楚雄市文史资料选辑(5)〔C〕, 1988.
- 〔11〕许尧坤. 刘少奇许昌讲话纪实〔J〕. 党的文献, 1999, (3).
- 〔12〕顾洪章.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 〔13〕内蒙古自治区志(大事记)〔Z〕.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 〔14〕蔡公. “汉阳事件”真相〔A〕. 武汉文史资料〔C〕. 2001, (2), 超星数字图书馆藏书.
- 〔15〕当代云南编辑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Z〕.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 〔16〕〔美〕弗里曼等. 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7〕夏正辉.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句容县的农业中学〔A〕. 句容文史资料: 第13期〔C〕.
- 〔18〕〔美〕A·M·罗吉斯. 乡村社会变迁〔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 〔19〕李若建. 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J〕. 中山大学学报, 2002, (5).
- 〔20〕易崇荣. 蓬溪县的农业革命大学〔A〕. 蓬溪文史资料(25)〔C〕. 超星数字图书馆藏书.
- 〔21〕詹姆斯·R·汤森. 中国政治〔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 〔22〕J·C·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2, (1).
- 〔23〕该书编委会.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教育志〔Z〕.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 〔24〕李若建. 大跃进时期的城镇化高潮与回落〔J〕. 人口与经济, 1999, (5).
- 〔25〕李若建. 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J〕. 社会学研究, 2001, (6).

(责任编辑 赵洪艳)

An Analysis of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CHEN Yan-yu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act-finding report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was drafted by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It analyzes the viewpoints and the impact of the report on the policy-making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Formosa; Japan;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Ration Behind Absurdity: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Mobility  
Model on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I Ruo-ji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mobility model. The change of social mobility model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cadres promoted the need of the education in the mass. The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ried to satisfy the nee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ducation was a feature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movement.

**Keywords:** Great Leap Forward; social mobility; education

The New Real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XU Jun-zhong, HUANG Shou-song

(The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procla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west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west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From Ideas of Substances to Essence:  
On the View of Substance in Locke's Essay